

10月12日,全国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提到:政府宁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确保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投入。

少上项目多投养老 当成为共识

养老保险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应当说,初步建立起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建立起不同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属于增量式的改革范畴,阻力小、进度快。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我们仅用3年时间基本实现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比原来预期的10年左右时间大大提前。”

但温家宝总理也指出,“真正实现全体人民‘老有所养’目标,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为此,“政府宁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确保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投入”。应当说,加大投入是政府履责的应有之义。在这方面,把确保投入摆在比上项目更重要的位置,表明中央政府意识到,单纯地上投资、上项目,其经济社会效益已不如尽快完善社会保险体系。无论是短期稳增长还是中长期内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社保体系建设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单纯地确保、加大养老保险投入,恐怕还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养老保险的问题。从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出发,更重要的在于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

客观地看,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建设仍处于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已经从过去几年的增量改革进入到存量改革阶段。能否实现不同社会保险制度间的无缝对接,不仅决定了社会保险的公平程度,而且也决定了政府投入的有效性。

仅以投入有效性为例。前段时间社会保险资金短缺以及由此带来的“延迟”的大讨论,实质不在于政府投入不足,实质在于制度不统一下政府的投入效率受到影响。第一,“三险并存”的格局,不利于提高政府统筹保险资金的可持续性运行。城镇职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三套保障制度分割,资金池不能共济,面临资金短缺时回旋余地小。第二,尽管这些年社会保险统筹层次不断提高,大部分地方实现了省级统筹,但尚未实现全国统筹。不同地区发展情况不同,在未实现全国统筹的情况下不能不影响到各地社会保险资金的可持续性。第三,与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相比,相当多的行政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不缴纳社会保险,在退休后却享受着比前者更为优越的养老待遇,这意味着前者在为不支付社会保险金的行政事业单位从业人员支付退休金,谁说是一个公平的制度。

政府加大养老投入当然值得期待,少上项目也要确保养老投入,这理应当成为共识。同时也要看到,未来几年,我国社会保险仍处于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在社会保险全国统筹、一视同仁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基础上,辅之以政府加大投入,我国的社保体制才能更好惠及全民。欣欣

宁夏吴忠黄河大桥辅道桥撤除了存在10年的收费站,当地民众拍手称快。不承想,日前有媒体报道,政府部门已在路口设置路障,让行人和车辆难以通行。据说,此举是担心有安全风险。

宁夏黄河大桥 免费后封路系乱作为

最近一段时间,“路桥免费”一再成为公共议题的热点。看来,“免费蛋糕”吃起来并不容易,免费以后的问题不比收费时少。

大桥免费本来是好事,为什么却办得窝心?有的大桥停止收费的同时,也一并停止管理措施,这一停让人心生忧虑:行人和车辆的安全谁来保障?而撤销收费站后旋即以“安全考虑”封路,这一封更让人心存疑惑:收费多年从未因安全问题而停止通行,怎么一免费就不安全了?

无论是一撤了之还是一封停之,都与民众期待相去甚远。这种态度恐怕是一种不作为乃至乱作为,与收费模式下的工作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难免让公众产生有关部门不情不愿、推卸责任的印象,更会生发“既得利益阻挡改革”之类的感想。

路桥可以免费,但管理不能免责。岂止不能免责,更应强化管理、提升服务。这是因为,在公共资源免费情况下,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课题,管理部门不仅不能缺席,而且需要有所调整和创新。重大节假日高速路免费,一下子刺激了民众开车出行,如果路桥公司和交警部门没有周全的预案,没有及时的政策调整,没有完善的救济之道,高速路难免变成停车场。同样,大桥免费之后,面对蜂拥而至的车流,如果不加强安全管理和疏导,就很可能变成“危桥”。

事实上,公共政策本身就是浑然一体的系统,既需要制定之前的问计于民,也需要制定之中的反复论证,甚至充分博弈,还需要强有力的实施以及实施之后的评估。取消收费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取消之后谁来维护道路质量,谁来保证交通畅通,谁来监管车辆超载现象,都是不能忽视的管理课题。

免费有免费的问题,不能一免费就当甩手掌柜,当然也不能因为免费后出了问题就想着重走收费的老路。切实可行的出路,还在于顺应公共资源回归公益属性的大趋势,探索和建立“免费管理”学。

当然,任何公共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路桥免费”推行后,出现的交通拥堵、停止服务、设置路障等现象,暴露了管理转型存在的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能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各种梗阻,不断积累经验,顺利度过磨合期。在民生善政越来越多的今天,如何做好“免费”功课,真正把好事办好,已然成为考验政府部门执政能力的一个新课题。 王石川

休闲时间下降 减损人们幸福感受

2011~2012年度国人依旧忙碌,人们的休闲时间连续3年下滑。调查显示: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每周花在休闲上的时间为10小时以下的占了受访者总数的41.1%。(10月15日人民网)

在本地,休闲从来就没有脱离奢侈品的范畴。人们似旋转的陀螺,或有目的性,或目的性不明确,或主动,或被动,总之是忙得不可开交,忙得不亦乐乎。

在现实生存中,忙这个词还有这样的重要特征:忙是压力,忙是内心纠结的外化,忙是身心俱疲,忙是幸福感的减损或丧失。

休闲,就是人们的闲暇。提到休闲的时候,大部分人所能意识到的首先是时间。闲暇是可资利用的个人资源,是逝而不再的时间。在经济学的概念里,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这样解释闲暇,“健康、财富以及享用它们的时间”。这句话捕捉到了这样一个思想:

我们必须安排好自己的时间预算,我们不能虚掷闲暇。闲暇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人可以按自己愿意支配的时间”。闲暇是我们个人特色的源泉。

休闲时间下降,不是什么好事情,它所能增加的只能是生活中的负能量。闲暇应是松弛的时间、自由的时间。可以说,在各行各业,超时工作都已成为普遍现象。“加班加点”的职场潜规则,榨取着人们的闲暇,带来许许多多的可预知和不可预知的后果。还可以这样说:资本让人过劳是可耻的,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是对人性的践踏。

实践证明,GDP不能代表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如今,在本土,一座城市即便没有惊人的GDP,却同样有可能在幸福排行榜上遥遥领先,原因就在于人们已逐渐把生活品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生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方式,而休闲又是考量国人生活方式新转变的重要标志。

闲暇不仅是个人财富资源,还构成社会财富资源。在闲暇中,人们才能有更多的阅读和思考。闲暇能够激发人们的创造灵感,带来激活原始创新能力的想象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好多创造性工作都是在闲暇中完成的,而不是在贫乏的紧张与忙碌中。

有了闲暇,每小时效用最大化的相同原则就能够运用于生活中许多不同的领域。这是经济学对闲暇的另一种解释。它不仅仅是一条经济学的规律,它还是一条理性选择规律的规律,关乎幸福感受的规律。

今语

父母看精神病丢人?



“世界精神卫生日”刚刚过去,让“精神健康伴老龄,安乐幸福享晚年”的主题言犹在耳,但近日广东某医院副院长告诉记者,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院看病,没想到病看到一半,老人的儿媳妇就赶来把老人拉走。她在门外劝老人说:“你来精神病院看病,这叫人知道了多丢人啊?”(据《羊城晚报》)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估计,我国各类精神病患者数量相当大,其中大约1600万是重症患者。而重症患者中,只有20%到医院就医,另外80%流散在社会,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无论从社会利益还是患者自身的利益考虑,对精神病患者进行一定的治疗甚至强制治疗都是必要的。可有些人把精神病当成丢人的病那该大错特错了。谁也不想得精神病,得了病就要医治,为了怕丢人而不愿意给老人治疗,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想法。 文/言者 图/春鸣

教育何必跟风“莫言热”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是否该入选中学生教材引起热议。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13日表示,目前该社已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认为,不要低估现在中学生的理解能力,他们完全消化得了莫言。(10月14日《京华时报》)

尽管笔者并不反对“中学生也有了解其作品的需要”、“完全消化得了莫言”的看法,但对“莫言作品入教材”过程,还是有些想法。就在莫言获奖后的第三天,便迅速“确定将莫言作品作为读本推荐给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如此亦步亦趋的教材过程,是否显得太过仓促、“巧合”?

莫言作品并不是得奖之后才写出来的,其文学价值也不是得奖之后才突然具有的,可为什么在得奖前莫言作品长期没有机会入教材,而一旦获奖,便迫不及待地收录进教材?有理由追问:这样的“入教材”,所依究竟是莫言作品本身的内在文学价值,还是因诺贝尔奖而来,更进一步,就算是因为诺贝尔奖,这究竟是出于文学敬仰,还是趋势媚俗心理?

是否该入教材,不完全是个单纯的文学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教育问题。文学与语文教育关系密切,但二者并非一回事。有中学语文老师指出,“把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读本推荐给中学生是可以的,但是决定将其纳入教材则需要慎重研究”。

强调这些,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莫言作品缺乏教育价值、不符合“入教材”的标准,只是有疑问,这样匆忙的“入教材”,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评判与审核?是否真正有利于莫言作品教育价值的充分发挥,并能够充分对学生、对教育负责?

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莫言热”,可谓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如“各地书店莫言作品被疯狂抢购”、“股市文化传媒板块上涨”、“莫言旧居将被整理打造为文化景点”等等。

不得不承认,在如今“名人经济”、“眼球经济”大行其道的时代,这种由诺贝尔奖催生并不断蔓延的“莫言热”,有某种现实必然性。但如此追逐热捧,是否值得反思? 张贵峰

办烟花大会莫忘了公共安全

10月13日晚,以“幸福西子湖”为主题的杭州西湖国际烟花大会发生烟花伤人事件,导致151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即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规模浩大的烟花大会有必要吗?

应尽的责任;再就是,活动组织方在遭遇突发事件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迅速反应、妥善处置?

从现场群众的反映看,这一次烟花“意外”伤人,有关方面的表现未能尽如人意。烟花大会不仅没有在“伤人”事件发生后立即停止,有受伤人员自称没有得到及时处置,尤其危险的是,其后人群中发生的推搡行为幸好没有扩散,不然,问题就严重了。

此外,早在此次烟花大会开幕前,当地就不断披露、渲染大会的“幕后消息”,包括各行各业人士的奉献精神,

等等。这些当然很吸引人,但也让人不免思考,与潜伏的巨大危险隐患相比,与公共财政的花费相比,璀璨却短暂的烟花大会未必是一个最佳选择。城市的魅力在于是否宜居,是否宾至如归,而不是一时的绚烂,时下很多城市热衷于搞大规模的活动,其实,效果未必最佳。

比如,杭州市完全可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广泛听取民意,吸纳专家意见,并参考国内外城市的通行做法,研究一下如何继续传统的课题。即便是单纯为地方形象考虑,也完全有可替代的做法。

退一步讲,即便烟花大会非办不可,在今天城市人群密度越来越大、公共安全越来越凸显的情势之下,也应该缩减规模,强化预案,切实做到危险可预知、可控制、可处置,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于杭

3359公里的路程,93天的步行,日前,北京的26岁小伙子樊蒙推着轮椅上的母亲抵达了西双版纳。樊蒙的母亲53岁,因患小儿麻痹平时出行不便,樊蒙经常推着母亲出去散步。母亲有个心愿,想去西双版纳,但一直未能实现。今年7月,樊蒙有出去走走放松的想法,母亲再次提起去西双版纳。结果第二天樊蒙就辞了工作带着母亲出发了。(10月14日《北京青年报》)

推着妈妈旅行 孝心始终在路上

羔羊跪乳,乌鸦反哺,何况人乎?孝顺是做人的本分,是伦理的基础,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孝顺,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用行动来证明,也可以用旅途来丈量。3000多公里跋涉,对樊蒙来说是身体的旅行,何尝不也是一场孝心之旅?轮椅走到哪里,孝心就延伸到哪里,旅途也许有终点,而孝心却只能始终在路上。

何为孝顺,1000个人可能有一万种判断,行孝没有定式,也不必拘泥于一格。让父母吃好穿好是孝顺,让父母精神富足也是孝顺;让父母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是孝顺,实现父母的心愿,带父母远出饱览旅途中的风景,也是孝顺。而樊蒙无疑属于后一种。做到后者未必比做到前者更有优越感,但在如今老人早已不愁吃穿,尽量满足父母的情感寄托,显得尤其可贵。

前不久备受关注的二十四孝就有这样几条: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如此种种,说到底告诉大家,孝顺父母不能没有物质供养,但不能止于物质奉养,毕竟老人需要更多的情感满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樊蒙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有个人的孝心展示,还有更宽阔的孝心传递。接受采访时,樊蒙表示,“我现在有个梦想,等回到北京后,我要给妈妈组建一个残疾人摩托车旅行团。让他们这些身体有残疾的人,也可以去想去的地方。”这种朴实而深情的做法,让人感动,也许正是母亲的例子,樊蒙深知残疾人旅行的不便而旅游念头又十分强烈,所以他能设身处地地想到残疾人的需求,这是孝心的升华,责任的提纯。

值得欣慰的是,樊蒙一路上也收获了情感的馈赠与善意的伴随。有无数人向他表达了敬意,力所能及的帮助,更有无数人向他表达了敬意,一个细节是,在樊蒙母子正经过普洱时,普洱市思茅一中两名高三年级学生,得知残疾老人旅行的不便而旅游念头又十分强烈,所以他能设身处地地想到残疾人的需求,这是孝心的升华,责任的提纯。

当然,有人说樊蒙是炒作,而我宁愿这样的炒作多一些。我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78亿。“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做子女的,孝敬父母是理所应当的事,不能讨价还价,不能注水,更不能只停留于言辞的表达上,但愿多一些樊蒙,但愿我们能够透过樊蒙检视内心,领悟孝顺须早和尽孝更要满足父母精神需求的真谛,从而以实际行动表达孝心。 南方

“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桥。它对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据现在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因此,在稳定的情况下,我作为心脏科大夫不建议做支架。”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在13日召开的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会上如是说。

暴利的心脏支架 该拆了

近年来,在反心脏支架迷信、心脏支架暴利的阵营中,胡大一绝对是领军人物。曾为该项技术的推广者、顶尖人物,经下手中的手术刀,并“倒戈”成为批评者,他的经历耐人寻味,他的言论振聋发聩。

“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无论是器材质量,还是手术可靠性,这个数字出自专家之口都是可怕的。其实,心脏支架手术的怪乱,早在2008年开始便有媒体陆续曝光,这一领域的医患纠纷也时有发生。至于被坊间所熟知的这组数字:一个国产支架,出厂价3000元,卖给医院27000元,一个进口支架出厂价6000元左右,卖给医院是38000元,这是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在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透露的。

据说,国外很少病人需要3个以上的支架,而国内不少病人被放5~10个。成都有一位患者居然被医院放了17个支架,筑成一道蔚为壮观的“钢铁长城”,堪称史无前例。每放1枚支架,患者都要被绑在“鬼门关”上走一遭,并且留下无尽的风险与麻烦——终生服药,可是这一切都被巨额的利益黑洞遮蔽了。因为暴利,医院争相开展此项手术,甚至给相关科室下达“支架任务”;因为暴利,医生乐此不疲,“支”人不倦,一个常年走穴的医生,一年灰色手术收入可达数百万,一些医生由此沦为“支架安装工”。

不可否认的是,心脏支架过度安装,并不完全是医生单方面原因,也有患者要求所致。很多患者认为吃药、打针太麻烦,放支架可以一劳永逸,并且能除病根,因此主动要求放。不管有多少原因,一种材料或手术被无原则、无节制地滥用是不正常且充满风险的。对心脏支架手术暴利以及由暴利引发的过度治疗,再不能坐视不理,默许纵容,任由发展。

过度治疗皆因支架暴利而起,治理心脏支架乱象,应当清除暴利,方能釜底抽薪。暴利支架与暴利药一样,说到底都是“以药养医”惹的祸,从生产商、代理商到医院、医务人员,一个长长的利益链条,吞噬着其中的巨额利润。因此,心脏支架回归理性,应当纳入“以医养药”之大视野,予以破解,而不能靠一纸“限价令”,给支架一个“天花板”了事。此外,一个独立于医院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和网络,对于医院所做的手术、医生所开的药品进行审核,防止将医疗当成单纯的逐利行为,以保障患者的权益,十分有必要。 练洪洋